

伪满体制下宗教团体的处境与应对*

——以基督新教为例

徐炳三

内容提要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日益紧缩,对教会的监控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并在日本教会的协助下重新整合东北基督教体系,将其改造为服务于侵略政策的工具。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西方传教士持低调忍让的态度,只有涉及原则问题时才进行有限度的抗争,即便如此也未能遏止教会的衰落。而日本教会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亦促使我们反思宗教在国际问题中扮演的角色。沦陷时期基督教会的遭遇,是伪满体制下各宗教团体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显示出国际政治博弈对宗教产生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伪满洲国 宗教团体 基督教会 政治处境

东北沦陷时期,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力量受到日伪政府的重视。一方面,日伪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宗教组织进行控制和打击,使其成为政治的恭顺婢女;另一方面,日伪政府在日本来华宗教团体和个人的协助下,重新整合当地宗教体系,将其改造为服务于侵略政策的工具。显然此种宗教控制模式是东北沦陷史中颇为重要的问题,对其展开探讨,有助于增强学界对侵华时期日本及其占领区政教关系的认识,加深对战时亚洲政治流变和宗教变迁关系的理解,丰富我们对日本侵华史的认识。但是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力度仍嫌不足,除佛教和神道教有过一些探讨外,其他宗教只是略有涉及,且鲜见系统细致的个案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沦陷时期东北基督新教为例^①,试对伪满体制下宗教团体的处境和应对问题进行解析,不足之处敬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伪满政权对基督教的政策

基督新教于1867年传入东北,在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爱尔兰、苏格兰长老会为主,丹麦信义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9CZS015),项目名称:“日据沦陷区政教协同体系的建构:以伪满基督教为研究中心。”

① 目前学术界对沦陷时期东北基督教的研究十分薄弱,笔者只看到两篇中文的文章专论,分别为李英武:《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新教》,《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2期;李英武:《东北沦陷时期天主教》,《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4期。两文征引的文献仅为一种日文资料,叙述粗疏且有讹误。间接言及于此的有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The Saint Andrew Press Edinburgh, 1967. 和Proctor J. H. "The Response of Scottish Missionaries to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Manchuria, 1872-1950", *Mission Studies*, Vol. 16-2, 32, 1999, pp. 47-70. 等著述,颇具学术价值,但都偏重于引用教会档案,中文和日文资料很少关注,内容难免有所偏颇。另有两种日文著作对日本基督教会在中国东北的活动作了细致的研究,颇具功力,然征引的文献亦限于日文,其价值取向也暗含了美化侵略的色彩。分见韩哲曦:《日本の満州支配と満州伝道会》,東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局1999年版;飯沼二郎编:《熱河宣教の記録》,東京:未來社1965年版。

会为次,其他小教派为辅的发展局面。东北新教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出现传教高潮,伪满时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故深为统治者所注意。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对基督教的政策处于变动状态,不同时段特点也有所不同。日本侵入东北之初,虽已开始了对基督教会的监控,但总体上比较和缓。传教士发现在“新政府成立的三年半里,地方和中央政权并未干涉教堂、街头、学校、医院的宣教活动,相反日本人和满洲国官员视我们为友好的精神。”^①日本人将《英文满报》免费寄给传教士,传教士乘火车可享受半价优待,满铁免费托运宗教书籍^②,政府还为教会免费提供教堂建筑用地。^③当时关内书刊禁止流入伪满,而上海出版的教会刊物《时兆月报》却被允许批量进入东北,甚至日伪官员也订阅月报以示支持。^④初期日本人对传教士的意见较为尊重。1932年法库县城遭日军空袭导致大量难民伤亡,当地传教士向关东军司令发出停止空袭的呼吁。后来一架飞机撒下一份谦恭的回复,解释军事行动的原因,要求传教士向民众澄清军队无意滥杀无辜,军事行动有所收敛。^⑤日伪政权还企图利用基督教来收买人心。九一八事变后,奉天伪市长土肥原贤二在沈阳成立“治安维持会”,指令日本牧师山下永幸为负责人,并拉上沈阳神学院院长英雅各(James W. Inglis),利用东北军粮秣厂的库存饼干救济难民,借以邀买人心。^⑥

此种宽松政策的出台,是因为初期日军在东北立足未稳,不想与传教士所属国对抗。东北沦陷初期秩序混乱,日本也希望借基督教稳定人心。满铁调查员大谷湖峰认为:“对现存的一切宗教,只要它们没有直接危及治安,就要尽可能地避免采取镇压、排斥的态度,要很自然地使民心觉悟到所应依据的道路。”^⑦这大致反映了初期日伪政府的态度。但是,伪政权很快就改变了对基督教态度,渐渐向严密控制、全面打击的方向发展。

从1934年起,在关东军的授意和支持下,南满铁路调查局对全东北的宗教情况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以此作为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满铁调查报告汇总为《宗教调查报告书》数辑,有4辑的内容涉及基督教,其中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达五百余页,将整个东北地区的教会组织派系作了极为细致的统计和描述。此外满铁还出版了多种宗教调查资料,除描述宗教现象外,还包含调查机构对基督教的态度和建议,成为伪满宗教法案的重要参考。

1938年伪满民生部正式颁布《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是为管理和控制东北基督教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法令。^⑧《规则》共分14大项,34小项,第一项明确指出法令的适用范围为“宣扬宗教教义或者执行宗教仪式的设施”和“住持、僧侣、道士、牧师、教师等从事宣扬宗教教义或执行宗教仪式的人”,其中基督教受到的负面影响颇为严重。

《规则》规定,设立寺庙、教会等布教场所时,要将设立原因、地点、宗派、传教方法、资金来源、建筑情况、传教者情况、与国内外关系等详情向民生部大臣呈报,得到其许可方可设立;布教场所的废

① F. W. S. O'Neill.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Manchuri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36-37, p. 135.

② 柳兆卿:《基督教传入辽阳》,《辽阳文史资料》第5辑,辽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版,第138页。

③ F. W. S. O'Neill.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Manchuri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36-37, p. 135.

④ 孙邦、于海鹰、李少伯编:《伪满社会》,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9页。

⑤ F. W. S. O'Neill.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Manchuri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36-37, p. 136.

⑥ 孙鹏翥:《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辽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3年版,第107页。

⑦ 大谷湖峰著,滕铭子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伪)民生部社会司1937年版,《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1988年版,第174页。

⑧ 法案全文见:《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伪)国务院法制处编纂:《满洲国法令辑览》,满洲行政学会发行1940年版,第69页。

止、合并、迁移等变更要向民生部大臣申请,须得到其许可并备案;布教场所的建筑、土地、用具等财产须详细登记呈报,如有变动须告知当地长官;传教者的履历、资格、职位、宗派等详情须上报当地长官,由其予以认可。如果布教者有“疏忽按照本法令及时呈报”、“违反公共利益或有其他不可允许存立的事由”或“有害于公共安全或当地风俗的行为”时,民生部有权取消设立的资格或禁止布教及其他教务。

本来一个政权对所辖范围内的宗教进行管理亦无可厚非,但如此严格苛刻的规定却并不多见,且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国际政治背景,这一法令绝非仅仅具有一般宗教管理的职能。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伪统制日益加强的时候,这一法令的出台使得伪政府可以合法地对基督教会进行事无巨细的控制,包括组织、信仰、人事、经济、布道等各方面。只有符合日本侵略者利益的教派才能够设立和维持,一旦教会的设立不符合日本的侵略精神或当局对教会有所怀疑,伪警宪就可以合法地进行调查,并随时以种种借口予以取缔。“至是东北教会已由外面之压迫变而受内部之统制阶段,所谓言论信仰集会之自由被夺无余”。^①

为了确保取缔规则的有效实施,1939年前后伪满下辖各省和特别市纷纷出台《布教者身份证明书发给规则》、《寺庙财产保管规则》等配套措施,法案精神在东北各地得以贯彻。^②法令的名称虽贯之以“暂行”二字,但是直到1945年日本败亡也未作任何的改动,故该法令可视为日伪宗教政策精神的集中体现。需要指出的是,日伪当局对宗教的打击力度往往会超乎法律之外,而非套用法律,《取缔规则》只是日伪宗教控制的法理基础,是在制度层面上对伪满宗教的强加。

日伪基督教政策由宽容到紧缩的转变原因是多重的。一方面,随着日本对东北控制力度的加大,整个东北社会渐渐陷入沉寂,日伪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可疑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社会组织。而《李顿调查报告书》出台后,西方国家不承认伪满的立场恶化了日本与英美等国的关系,这些国籍的传教士不再是日本维护的对象,转而成为敌对势力。另一方面,日伪当局对教会组织的警惕和怀疑也不断加剧,认为基督徒“只把肉体奉献给政府,而把精神奉献给基督的思想,是轻视国家的观念,有导致否定国家的危险”。^③日伪更担心的是教会与所属国的联系,他们认为传教士国籍问题是“不能轻视的问题”,“现在的基督教传教体现了欧美人扩张的政策”^④，“基督教系的传教士大多都有间谍嫌疑”。^⑤因此,东北基督教政策日益紧缩势在必然。

二 日伪政权对东北教会的监控和打击

伪满政权中管理基督教的机构有伪文教部礼教司、民生部社会司、协和会等,而直接对教会进行监控和迫害的则是宪兵队和警察,在他们的联合打击下,东北教会经历了严酷的寒冬。

首先是对教会的全面监控。1932年日本宪兵对某些教会的检查已成为日常惯例,任何不符合关东军精神的事物都将受到审查,有颠覆企图或影响者将立即被禁止。公民训练、满洲问题及中外

① 李廷魁:《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十届监事扩大会议记录》,中华基督教会刊行1946年版,第60页。

② 《伪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456号、第2024号,转引杨家余:《内外控制的交合:日伪统制下的东北教育研究(1931~1945)》,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页。

③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20页。

④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148页。

⑤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36页。

关系研究均在禁止之列,教科书中不符合日伪精神的内容都要删掉,与国民党时代有关的地图或标志等都须去除。特务有时会参加宗教会议,一次某牧师演讲时提到“上帝之国”就遭到他们的反对,因为这“带有太多的政治意味”。^①在这种严密的监视下,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吉林青年会某干事就因其年度会议中的发言而遭监禁。^②

七七事变后,便衣特务出入教会更加频繁,事无大小都要过问。他们将传道人员登记入册,对教会信众严密观察。尤其是1939年日美关系紧张后,凡与西方传教士有联系的传道员都被列入所谓“视察人”的黑名单。有可能刑事犯罪者为“刑事视察人”,具有反满思想者为“特务视察人”,较重要的人物为“要视察人”,监视得相当严密。诸多传道人员被定为“要视察人”,常遭盯梢或盘查,受到各种刁难。到了1940年,日伪警宪对教会的监视更加公开化,传道人员每次外出传教都要得到警察局的批准,回来时要及时汇报。“这时日伪宪特不仅便衣人员,连身着军警制服,腰佩战刀的公开身份者,也大摇大摆频繁进入教会办公室,有意制造恐怖气氛”。^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提出“击灭英美”的口号,扬言基督教与英美一气,要狠狠整治,特务对中国信徒的跟踪、监视和敲诈成为家常便饭,东北教会已经完全被日伪控制于股掌之间,不具备丝毫的反抗能力。

伪警宪打击教会的另一种手段是逮捕和监禁,其对象是思想与“满洲国”精神不合、或有进步倾向的教会人士。伪政府认为这种迫害手段既可击垮可疑分子,又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除了贯穿于整个伪满时期零星的逮捕外,大规模的拘捕行动有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1935年秋,日本宪兵队以“反满抗日”为名,先后逮捕了46名基督徒,大都为教会上层人士。同时也拘捕了英美烟草公司和上海银行沈阳分行的一些雇员。^④结果被判徒刑者5人,死于非命者1人,患不治之症者1人。其中基督徒张尚民和牛光仆各判20年徒刑,抗战胜利后才得以释放。牧师刘国华、女学生刘爱光等人被长期拘禁和严刑拷打,遭到非人的折磨。这次大逮捕的直接动因源于1932年国联派往东北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沈阳基督徒将揭发日军罪行、反对建立伪满的五百封信送交调查团,有的牧师还提供弹片等证物。^⑤日本人对此事恨之人骨,一直耿耿于怀,只是当时迫于舆论尚未动手,故1935年的大逮捕可谓蓄谋已久。^⑥一些偶发因素也是导致大逮捕的重要原因,如神学院学生张尚民和牛光仆开展每人每天节约一分钱资助辍学学生的“一分钱运动”,被视为共产党行为,两人均遭逮捕。^⑦此外大逮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1935年前后是东北抗联最为活跃的时期,给日伪带来沉重的打击,东京对伪满政府施加压力,部分官员被撤换,“因此满洲国政府急于找到这样一个或一些群体,他们受过教育并与国外势力有联系,他们可能被视为满洲国盗匪的鼓动和促成力量。政府自然把矛头指向教会领袖,因为只有他们在东北中国人中创建了教育阶层”。^⑧

第二次发生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此次大逮捕是日本与英美等国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结果。被捕者均为西方传教士,他们被关押在沈阳汇丰银行大楼的顶层,后被辗转遣送回国。同时,部分中国基督徒也因与传教士的关系而遭到迫害,如1942年哈尔滨浸信会牧师蔡约翰和圣洁会牧

① “Christians and the Present Manchurian Regim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3, No. 6, Jun. 1932, p. 391.

② F. W. S. O'Neill,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Manchuri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36—37, p. 143.

③ 孙邦、于海鹰、李少伯编:《伪满社会》,第590—591页。

④ “Christians Arrested in Moukde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6, No. 11, Nov. 1935, p. 765.

⑤ 柳兆卿:《基督教传入辽阳》,《辽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42页。

⑥ 当时每个被捕者被讯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向李顿调查团提供过证据吗?”参见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The Saint Andrew Press Edinburgh, p. 351.

⑦ 马维权:《黑龙江宗教界忆往》,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56页。

⑧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351.

师杨在天被捕受刑,日本人要求他们供出与美国牧师的关系。^①

日伪对东北教会各项事业的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首先是基督教教育系统。从伪满建国到1939年之间,教会学校尚能正常运行,但受到各种掣肘。日语成为教会中学的第一外语,高中学日语的时间是汉语的3倍;培养技术工人的实践课成为重点;禁止使用中国出版的课本;课堂上不能讲授时事,不得谈论宗教;鼓励学生向警察告密;不得开办短期圣经学校或假期学校;地方官替代教育家行使学校的监督权;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受到政府歧视,毕业生就业和教会学校的师资来源都成为问题。^② 伪政府还强迫教会中学祭孔和参拜神社,这违背了基督教不拜偶像的原则,从而引发对抗导致教会中学的终结。1939—1940年,日伪以收回教育权为借口,通过强买校产的方式没收教会中学数所,小学也大部分停办或被没收。余者在太平洋战争后大量关闭,至1943年底东北新教中等教育系统完全被摧毁。

沈阳神学院亦遭干涉,神学院低级课程不得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西方历史的内容。日伪政府曾安插日本讲师渡部守城和平野一诚进入学院作为耳目,不久又派来一个官员,不时发表基督教与“满洲国”关系的演讲,宣扬神社参拜为中心的帝国主义观念。^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学院院长被逮捕关押三个月,日本长老会牧师被任命为院长,并成立一个由日本人任主席的学院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完全听命于关东军,至此日本人完全控制了神学院。^④

伪满中后期基督教文字事业受到严重影响。“公开的研究发表,或是刊物的编辑,都在被禁止之列”。^⑤ 拥有中国关内的出版物成为一种危险,基督徒不得不销毁了带有上海印记的书籍。文字社团工作被迫中断,圣经公会传教士罗培生(J. C. F. Robertson)只能进口上海印刷的圣经单张在沈阳装订。因为东北的出版物都要印上作者的名字,这样警察就可以找到作者,罗培生不得不在《圣经》上附上自己的姓名以承担责任。^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内书报被限制出关,东北联合会撤销了书报部,全体书报员被迫转业。

医疗事业方面,沈阳医学院在西方传教士被捕后转归日本人管理,阿城、铁岭两医院被地方敌伪政权强行收买,辽阳医学院一度被敌伪政府接收改为“国立”,盛京施医院改为附属医院。其他尚未被没收的医院艰难维持,直至抗战胜利。^⑦

三 日本教会受命对东北新教的控制

日伪政权控制东北教会的另一种形式,是利用日本基督教的组织和个人控制东北教会,通过控制中国基督徒进而影响东北社会。

日本教会人士早在1903年就在天津活动,其后日本公理会进入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圣洁会也传到上海。^⑧ 在东北地区,日本基督教是随着日俄战争传入的,1939年前后东北地区已经有8个日本宗派,教会四十多个,信徒5500人。^⑨ 这些教派的传教对象基本都是日本在华侨民,很少涉及

① 孙邦、于海鹰、李少伯编:《伪满社会》,第594页。

②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131.

③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149.

④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150.

⑤ 李廷魁:《东北教会的昨日和明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刊行1946年版,第10页。

⑥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130.

⑦ 王彼得:《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会议录》,中华基督教会刊行1948年版,第111页。

⑧ “Japanese Overseas Mission Work”,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1, 1933, p. 231.

⑨ N. Kobayashi.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chukuo”, *The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40, 1940, p. 155.

中国基督徒。1933年9月,日本长老会牧师日匹信亮和山下永幸在东京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开始向东北的中国人传教。不久满洲基督教会发展为南满、北满和热河三个教区,1938年三教区下辖教会已达15个。^①七七事变以后,山下等人将满洲基督教会改组为东亚传道会,除管辖原有的东北各教区外,又开辟了蒙疆、华北、华中、华南4个新教区,将传教触角从东北一直延伸到海南岛,辐射范围涵盖了大部分中国沦陷区。^②日本对中国沦陷区基督教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日本教派实现的。

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新教教派林立、章法不一,颇不利于集中控制,日伪政权希望能够将各派联合起来,施以统一管理。1936年7月6、7两日,伪文教部召集东北基督教各派代表20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基督教的统一管理问题。^③此时恰逢东北大会第26届会议召开,满洲基督教会领导人山下永幸邀请日本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海老泽亮到会演讲,二人均参加了文教部的会议,对官方的意见鼎力支持。事后山下宣称自己得到了日本军方及伪政府的准许,决定成立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6年12月1日联合会在沈阳正式成立,英国传教士胡成国任会长,方德立(J. W. Findly)、李毓麟任副会长,山下永幸、高光达、华茂山任干事,山下永幸掌握着联合会的实权。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的加盟教派13个,教会数达494个。其中长老会系统有309个教会,占62.55%强;而满洲基督教会的教会数只有15个,仅占3.04%。^④但因幕后有日伪政府的主使,这个仅占3.04%的宗派成为整个联合会的真正领导者。联合会的成立便利了日本对东北教会的控制,为东北教会进一步合一打下了基础。

为了配合日本宣扬的所谓的“日满亲善”精神,山下永幸不遗余力地培养亲日人才,时常组织东北教牧人员前往日本观光访问。1937年4月,山下率领“满洲基督教代表团”胡成国、刘国华等14人去日本视察;1938年10月派英国传教士柏基根(T. M. Baker)、牧师金玉清赴东京,代表英、“满”两国教会向“日本基督教长老会全国会议”道贺;1940年山下与胡成国代表东北基督教会参加日本皇纪二千六百周年纪念日;1941年派马福江、王子真等八人参加日本东京青山学院主办的“东亚基督教讲座”等等。这些到日本参观访问的教会人士不得不去听“大东亚新秩序”、“唯神之道”、“神社参拜礼仪”等反动宣传,在各种讲座上被迫学习“东亚都应顺服日本的领导”、“日满华同文同种,必须一德一心”等反动理论。^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下永幸回国,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替了他的职位。1941年12月17日,石川邀请满洲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东北大会总干事胡成国召开东北大会,改原来的教务会为临时措置委员会。会上推举石川为会长,全权代表东北大会向伪满政府联络办理一切事宜。12月31日,石川与被日伪关押在汇丰大楼中的英国传教士邱树基和方德立订立合同,将教会所有房地产和部分资金移交给临时措置委员会。^⑥1942年3月27日石川四郎在长春西五马路教会组建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将东北基督教15个教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合并在一起,划分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春,由是日伪完全控制了东北教会。^⑦

①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编:《满洲基督教年鉴》,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8年版,第178—181页。

② 《宗教调查资料第7辑:基督教调查报告书》,(伪)民生部厚生司1940年版,第359页。

③ 满洲情报所编、滕铭子译:《满洲的宗教》,《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满洲宗教》,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88年版,第212页。

④ 《大满洲帝国年鉴》,(伪)满洲国通讯社1944年版,第551页。

⑤ 孙鹏翥:《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3页。

⑥ 孙鹏翥:《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6页。

⑦ 李廷魁:《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十届监事扩大会议记录》,第62页。

“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实行组织、信仰、指挥、思想、行动五个统一^①，对教会所属事业如医院、学校、圣经会、男女青年会、神学院等严加控制。“满洲基督教会本部”的建立是日伪政府实现对东北教会全面控制的标志。日本统治者通过日本教会势力，成功地将东北基督教在组织、思想和行动方面进行了改组和改造，此后整个东北基督教被纳入日伪所预想的轨道中来。1942年2月，石川发布通告，指令东北教会为圣战、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为把持教育权，石川兼任神学院院长。1944年2月，经伪文教部发令命名，组建满洲基督教财团法人，石川四郎拥有绝对的权力。1945年4月，石川召开教区长会议，抛出国民教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国民道义确立运动等所谓的“教化五大运动”^②，至此东北基督教会被迫成为日伪利用的工具。

四 东北新教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应对

面对艰难处境，东北新教各派的政治态度并不一致。总体上看西方宗派的态度大体相似，日本教派则大相径庭；教会内部又有传教士和中国信徒之别，政治态度有同有异。故此有必要对不同群体进行具体分析。

就西方传教士而言，他们尽可能与日伪政权保持良好关系，以保证教会的生存和发展。在多数时候有原则地忍让是其基本的处世准则，讲究策略地与日本人打交道是其重要的生存手段。日伪政府曾强迫教会学校将日语取代英语作为必修课，教会对此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传教士倪裴德(F. W. S. O'Neill)甚至公开表示支持。^③日本人为了断绝中国关内外的联系，要求基督教各派名称中凡有“中华”字样的，均须改为“满洲”。东北长老会亦表示赞同，但遭到爱国基督徒的强烈抵制而未获通过。于是长老会在1934年7月派员与伪政府接触，事后强令改“中华基督教会”为“满洲基督教长老会”，并认为此举对“教会团结具有宝贵价值”。^④

日本教会能够迅速掌控东北新教，也有西方教派自身的原因。西方传教士与日本教会的关系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紧张，他们总是尽力与日本教会保持良好关系。东北传教士曾多次应邀访日，东北的教会人士经常参加日本人的集会，与日本牧师联合祈祷。^⑤“满洲基督教联合会”组建的过程中也多有西方传教士参与的身影。七七事变后，处于危境的东北教会在日本教会中寻求靠山的现象非常普遍。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从日本请来牧师小仓，由他出面与日伪政府交涉，避免了“满洲基督教会本部”的直接控制。哈尔滨西门脸教会分别拉来山下永幸和石川四郎做顾问^⑥，东北长老会“为应付现实”也把石川拉拢进来，“经彼多方奔走，教会产业始得保守，未被没收”。^⑦

随着日伪基督教政策的不断紧缩，西方教会的自由空间日益缩小，忍让和谨慎原则往往不能发挥效力，在基督教根本原则遭到践踏时，传教士也会进行有限度的抗争。1935年大逮捕事件发生后，传教士为营救被捕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请山下永幸等日本牧师出面讲情，并亲自造访日本官员和英日领事、致信日本最高官员，传教土方德立还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为被捕者辩护。^⑧1938年

① 孙鹏翥：《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17页。

② 孙鹏翥：《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怎样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政策服务》，《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第120页。

③ F. W. S. O'Neill,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Manchuri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36—37, p. 143.

④ F. W. S. O'Neill,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Manchuri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36—37, p. 137.

⑤ F. W. S. O'Neill,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Manchuria",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36—37, p. 137.

⑥ 孙邦、于海鹰、李少伯编：《伪满社会》，第596页。

⑦ 王彼得：《东北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界总会议录》，第111页。

⑧ 参见 T. M. Bake. *Pamphlet 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 Describing the Arrest of a Prominent Chinese*, 1937. 转引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p. 96—111.

《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颁布后,哈尔滨的美国传教士集体致函伪民生部大臣,指出该法令破坏了信仰自由,希望政府收回成命。^① 1936年日伪要求教会学校祭拜孔庙,东北长老会表示允许学生祭孔,但是他们不能亲自参加,也不能领导学生参加。这遭到日本人的拒绝,教会则坚称“将对福音的真理作明确的、不妥协的见证,对上帝保持不动摇的忠诚”。^② 双方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日伪又强迫教会学校参拜神社,此要求在1938年1月的长老会会议上以100:4的投票结果遭传教士拒绝。^③ 接着日伪政府的态度愈加强硬,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建立不以宗教为目标的法人,否则必须关闭。教会方面拒不妥协,最终于1939年放弃了除医学院和神学院外的学校,学校财产于1940年被强行收购。^④

中国信徒的态度与西方传教士相似,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在没有任何羽翼庇护的情况下,若想生存沉默和退让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沦陷区多数人民的无奈。但中国信徒毕竟是炎黄赤子,民族主义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常常有所展现。如日本利用中国兵工厂饼干救济灾民的行动并未得到中国教会的响应;日本人建立中国牧师联合委员会的号召也因遭抵制而流产;日本教会提出给中国牧师400元捐助,他们坚辞不受;日本基督徒欲向一个教会组织提供帮助,连提10次均遭拒绝^⑤;中国信徒偶尔也会对抗政府,如敦化在庆祝“满洲国庆日”之际发出特别通知书,但基督教没有参加^⑥;吉林青年会在溥仪视察教会时拒绝临时检查^⑦;教会小册子上常有“国耻纪念日”、“不承认日满”、“我等中国人”等词句^⑧;教会学校师生常有反日不敬的言行^⑨;日伪协和会强迫基督教各派入会的努力也宣告破产。^⑩ 这些大都是自发的零星行为,但亦反映出中国信徒与西方传教士的差异。

日本教会配合日伪政府控制东北基督教,其动机很复杂。日本教会与政界联系密切,部分日本信徒还有政治背景,具有配合日本侵略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思维确定无疑。日本基督徒首先是日本国民,在多数日本民众为军国主义思想欺骗而掀起民族主义狂潮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思想亦不足为奇。战争期间日本基督教界的主流对日本侵略扩张政策是支持的,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前后,日本基督教界都曾发表支持日本政府的宣言,并在实际行动上对侵略活动大力协助。^⑪ 另一方面,很多日本信徒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不自觉地日本政府利用,成为侵略者的帮凶。如日本长老会长老武藤富男,坚持认为“满洲国”就是协和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信仰、精神和道德符号,但

① *Report of Conference of Missionaries Held in Harbin*, 3rd and 4th December 1938. 转引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153.

② Proctor J. H. "The Response of Scottish Missionaries to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Manchuria, 1872—1950", *Mission Studies*, Vol. 16, 2, 32, 1999, p. 59.

③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135.

④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361.

⑤ "Christians and the Present Manchurian Regim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3, No. 6 (Jun. 1932), p. 392.

⑥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50页。

⑦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38页。

⑧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40页。

⑨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39页。

⑩ 大谷湖峰著,滕铭予译:《宗教调查资料第2辑:吉林、间岛、滨江省宗教调查报告书》,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长春文史资料1988年第四辑:满洲宗教》,第150页。

⑪ 金田隆一著:《昭和日本基督教教会史:天皇制と十五年戦争のもとで》,東京,新教出版社1966年版,第287—297页。

军队却嘲弄性地把这当成麻醉人民的手段。^①一些日本信徒并不赞同日本政府的行为,如辽阳文德中学的吉田悦男牧师就因不拜神社、反对战争而遭逮捕。^②在日本也有很多基督徒因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而遭到迫害。因此即便是日本教会内部的政治态度,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 结语

日伪对基督教会的监控与打击,是整个东北宗教控制工程的组成部分,日本人首先将所有宗教放在同一个框架内加以考量。如满铁推出的调查资料《宗教调查报告书》,基督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他宗教亦被包含其中,并附有调查机构对各宗教的不同态度和对伪满宗教政策的建议。而涉及具体措施,无论严厉打击,还是怀柔安抚,都非基督教所独有,而是所有教派共同承受。伪满宗教法令《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也是一个针对东北绝大多数宗教的法案,并非仅仅指向基督教。在宗教组织改组方面,日伪政府的做法也如出一辙,日本神道教、佛教等宗教团体和个人纷纷来到东北,配合日伪政府对本土宗教进行控制和改造。东北的主流宗教均出现政治性重组和联合的情形,如佛教成立佛教总会、道教成立道教总会、伊斯兰教成立回教总会、基督教成立基督教联合会等等。^③通过联合和合一,日伪政权牢牢地控制了东北的各种宗教组织,同时将其改造为服务于其侵略利益的工具。当然,不同宗教由于各自特点不同,在具体应对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政治境遇是基本相似的。

沦陷时期的东北宗教团体面对的是一种紧张而又复杂的政治局面,日伪政权通过种种措施对其进行控制和打压,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日本军政势力企图使整个东北社会完全彻底地听命于日本,任何可能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力量必须被控制或被清除。宗教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独立的思想性,无疑会引起日伪统治者的疑心,促使他们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将这种潜在的威胁去除掉。这种控制和打击也并非仅仅针对东北宗教,它只是所有社会控制的一环,只不过这一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已。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无论东北宗教的哪个派别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高压政治的影响,感受到与日伪政权之间的张力,即便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来华宗教团体亦难以摆脱幕后政权的操纵和控制。诸多事实见证了政治力量对宗教的撼动力,也足以展示出国际政治风云对宗教传播和发展的深刻影响。东北宗教界人士曾经历了多次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积累了足够多的政治智慧和应对经验,然而在沦陷时期即便是不问政治、小心翼翼地甘心顺从也难以保障宗教的生存和发展。这恰恰说明了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宗教组织与国家政权的博弈是不对等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博弈,一旦国家政权下决心对其实行打击,宗教大都难逃衰亡命运。而日本宗教团体的政治性参与,也鲜活地昭示出宗教在国际问题中扮演的角色: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侵略者控制和利用,将会对被侵略地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参与其中的宗教人士或许带有良好的愿望,却不自觉地成为侵略势力的帮凶。相关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继续研究和不断反思。

(作者徐炳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Austin Fulton, *Through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Church and Mission in Manchuria 1867~1950*, p. 141.

② 柳兆卿,《辽阳基督教文德中学校史》,《辽阳文史资料》第1辑,辽阳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5年版,第82页。

③ 参见程力,《伪满时期日伪当局宗教统治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稿2005年。